

SCHOLAR'S PARAPHERNALIA
CLASSICS OF FORBIDDEN CITY
故宫经典

文房清供

故宫博物院编 EDITED BY THE PALACE MUSEUM
紫禁城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故宫经典 CLASSICS OF FORBIDDEN CITY
SCHOLAR's PARAPHERNALIA

文房清供



故宫博物院编
EDITED BY THE PALACE MUSEUM
紫禁城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房清供 / 张荣, 赵丽红主编. —北京 : 紫禁城出版社,
2009.6
(故宫经典)
ISBN 978-7-80047-827-7

I . 文… II . ①张… ②赵… III . 文化用品—中国—明清
时代—图集 IV . K87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3436号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任 郑欣淼

副主任 李季 李文儒

委员 晋宏達 王亚民 陈丽华 段勇 肖燕翼
冯乃恩 余辉 胡锤 张荣 胡建中 闫宏斌 宋纪蓉
朱赛虹 章宏伟 赵国英 傅红展 赵杨 马海轩 娄玮

**故宫经典
文房清供**

主编: 张荣 赵丽红

摄影: 赵山

撰稿: 刘岳 刘伟 张丽 张林杰 杨勇
郑宏 郭玉昆 倪如荣 恽丽梅 徐琳 徐巍
高晓然 黄卫文 谢丽 蔡毅

责任编辑: 徐小燕 刘辉

装帧设计: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王梓 吴鹏

出版发行: 紫禁城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16 010-85007817 传真: 010-85007808

邮箱: ggzjc@vip.sohu.com

制版印刷: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毫米 1/12

印张: 25

字数: 110千字

图版: 314幅

版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书号: ISBN 978-7-80047-827-7

定价: 290.00元

经典故宫与《故宫经典》

郑欣森

故宫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经典文化。从故宫的地位、作用及其内涵看，故宫文化是以皇帝、皇宫、皇权为核心的帝王文化、皇家文化，或者说是宫廷文化。皇帝是历史的产物。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国家的象征，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核心。同样，以皇帝为核心的宫廷是国家的中心。故宫文化不是局部的，也不是地方性的，无疑属于大传统，是上层的、主流的，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堂皇的部分，但是它又和民间的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故宫文化具有独特性、丰富性、整体性以及象征性的特点。从物质层面看，故宫只是一座古建筑群，但它不是一般的古建筑，而是皇宫。中国历来讲究器以载道，故宫及其皇家收藏凝聚了传统的特别是辉煌时期的中国文化，是几千年中国的器用典章、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以及学术、艺术等积累的结晶，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物质载体，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象征物，就像金字塔之于古埃及、雅典卫城神庙之于希腊一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故宫文化是经典文化。

经典具有权威性。故宫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它的地位和价值是不可替代的。经典具有不朽性。故宫属于历史遗产，它是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的创造和精神，具有不竭的历史生命。经典具有传统性。传统的本质是主体活动的延承，故宫所代表的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代中国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与

今天的文化建设是相连的。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经典文化永远都是其生命的依托、精神的支撑和创新的源泉，都是其得以存续和赓延的筋络与血脉。

对于经典故宫的诠释与宣传，有着多种形式。对故宫进行形象的数字化宣传，拍摄类似《故宫》纪录片等影像作品，这是大众传媒的努力；而以精美的图书展现故宫的内蕴，则是许多出版社的追求。

多年来，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好的图书。同时，国内外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许多故宫博物院编写的好书。这些图书经过十余年、甚至二十年的沉淀，在读者心目中树立了“故宫经典”的印象，成为品牌性图书。它们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模糊起来，而是历久弥新，成为读者心中的故宫经典图书。

于是，现在就有了紫禁城出版社的《故宫经典》丛书。《国宝》、《紫禁城宫殿》、《清代宫廷生活》、《紫禁城宫殿建筑装饰——内檐装修图典》、《清代宫廷包装艺术》等享誉已久的图书，又以新的面目展示给读者。而且，故宫博物院正在出版和将要出版一系列经典图书。随着这些图书的编辑出版，将更加有助于读者对故宫的了解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故宫经典》丛书的策划，这无疑是个好的创意和思路。我希望这套丛书不断出下去，而且越出越好。经典故宫藉《故宫经典》使其丰厚蕴含得到不断发掘，《故宫经典》则赖经典故宫而声名更为广远。



清人画弘历古装坐像（局部）

目 录

- 002 / 序言 文房清供之沿革
- 006 / 文房清供概述
- 014 / 笔之属
- 116 / 墨之属
- 160 / 纸之属
- 194 / 砚之属
- 254 / 印章、印泥盒、印匣
- 276 / 多宝文具匣



序言 文房清供之沿革

张 荣

文房清供是中国传统文房辅助用具的一种雅称，也称文房杂器，又因多由精美的工艺造型和极具观赏性的器物组成而被称为文玩。文房清供种类繁多，用途广泛，如笔筒、笔插、笔匣、笔掭、笔洗；墨盒、墨床、水注、水丞；镇纸、臂搁、裁刀；砚滴、砚屏；印章、印盒、帖架、文具箱等，可谓包罗万象、琳琅满目。文房清供的制作工艺繁复，包括绘画、书法、烧造、雕刻、镶嵌等多种工艺；材质丰富，金、银、铜、铁、玉石、漆器、陶瓷、玻璃、珐琅以及竹、木、牙、角、匏等无所不备。这些功能各具的文房清供与笔、墨、纸、砚一起，构成了笔耕丹青的必要条件，成为书斋中不可或缺的陈设雅玩。

早在距今三千多年的殷商时代，就已经出现玉制调色器，^[1] 砚就是从研磨器和调色器逐渐演变发展而来的。砚、笔、墨、铜削、无字木牍等整套文具的出土，则首见于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2] 在纸张发明以前，人们在竹木简牍上书写，书刀就是专用于修治简牍的工具，其材质初为青铜，后为铁制，汉代尤为普遍。在汉代，已经出现了玉或铜制的水注、笔洗、砚滴等，如江苏扬州老虎墩东汉墓中出土的一件白玉飞熊砚滴，造型夸张，雕琢精美。^[3] 汉代砚滴多为龟蛇熊羊等动物造型，古朴浑厚，这些早期的文具不仅形态生动传神，并且具有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成为汉代文具的典型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士人纷纷避世专心攻艺，天文、地理、哲学、艺术等领域都出现了很多贤达之士。这个时期是我国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这种背景，对文房用具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此时相继出现了水盂、镇纸、笔筒、笔格、臂搁等诸类器物。随着瓷器在社会生活中应用领域的扩大，在早期青瓷中尚不多见的瓷制文房用具，到两晋时大量出现，用青釉制作的水注、砚滴、水盂、笔筒等，造型古拙，胎质

坚硬，釉色莹润，纯净如翠，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东晋青釉笔筒是最早的笔筒实物。六朝词赋中有不少是咏赞文房用具的，且文人雅士赏玩文房清供的趣事多有记载。晋代傅玄的《水龟铭》、南朝梁简文帝萧纲的《咏笔格》、南朝梁吴均的《笔格赋》、南朝梁庾肩吾的《谢赉铜砚笔格启》等，除了在文中详细地描绘了这些文具的材质、用途、工艺外，还涉及到了其陈设和摆放的位置。南朝徐陵的《玉台新咏·序》中有“琉璃砚匣终日随身，翡翠笔床无时离手”之句。^[4]

隋唐是我国科举制度的起源和兴起期，文人意识趋强，书法和绘画艺术渐盛，文房用具品类渐众，材质多样。唐代陆龟蒙《和袭美江南道中怀茅山广文》有：“自拂烟霞安笔格，独开封检试砂床。”的诗句。^[5] 世人开始侧重于文房用具在形式、工艺、材质上的设计与欣赏，以及使用的意境与品味。在崇尚华丽的唐代，出现了用三彩釉、褐色釉、黄釉、白釉等烧制的文房用具。如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唐代青釉点褐彩龟形水丞，就是此时有代表性的文具。这些器物造型别致，色彩艳丽，匠心独具，反映出当时工匠们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艺。

宋代文房用具的品类更加丰富，不但承续了晋唐成熟的制作技术，而且造型独特，纹饰规整，古朴典雅。士人对文房用具形态美的追求，不仅拓展了其实用价值，也提升了收藏价值。文人雅士撰写了大量有关文房用具的书籍，并将其视为一门学问。南宋赵希鹄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将文房清供整理出书的人，他在《洞天清禄集》中考证辨析了诸多文房用具，共分古琴辨、古砚辨、古钟鼎彝器辨、怪石辨、砚屏辨、笔格辨、水滴辨、古翰墨真迹辨、古今石刻辨、古画辨十门。而且书中还描述出一个理想化的书房，精辟地道出了文房清供的审美功用：“明窗净几，

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端研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6]南宋的林洪作《文房图赞》，把文房用具化为十八人，各封以官，并为文赞之，如称水盂为“水中丞”，并赐号“玉蜍老翁”。^[7]浙江诸暨南宋董康嗣墓出土了一套石质文房用具，有蕉叶白端砚一方，石雕山峦笔架，犀牛镇纸两件，龟钮水盂，其石质色泽黝黑，细腻滑润，造型别致。^[8]正是宋代文房清供发展的缩影。元代是一个多元文化相融合的时期，形成了汉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世俗风尚与文人志趣的相容，这些都使元代的文房清供在造型上更加丰富多彩。例如，宋以前早期的笔架大多做成山峰连绵状，与自然的山峰极为形似。而到了元代，山峰状笔架则大多讲究对称，在艺术形式上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工艺上则百花齐放，不断创新，融各种制作技法于一体，不仅从数量上，而且在品质上都明显优于前朝。元代罗先登仿《文房图赞》的体例，写成《续文房图赞》，扩充了前人对文房用具的认知。《元史·不忽木传》记载：大臣不忽木因功受“沉水假山、象牙镇纸、水晶笔格……。”足见文房用具的重要性。

文房清供经过宋元的普及和拓展，到明代中叶进入了勃兴期。其时，商业及手工业蓬勃发展，经济高度发达，科举制度鼎盛，文人阶层迅速扩大，人们对文房用具的需求日益增强。《广志绎》载：“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雕镂亦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文房清供除了实用性外，更加讲求装饰性与艺术性。除了陶瓷、玉、铜、象牙外，还增加了漆器、竹、木、珐琅等材质。形制追求清、奇、古、

雅，或效法古物，或取意自然。文房清供的收藏成为文人雅士和商贾追求的一种时尚。民间工匠的社会地位也有了相应的提高，从而表现出极大的艺术创造力。有明一代载入史册的著名工匠有百人之多，他们所制器物一时身价百倍，成为世人争相收藏的珍玩。竹雕工艺更是脱颖而出，涌现出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嘉定竹雕大家，遂使竹雕文具成为文房大宗，延续几百年不衰。文人雅士纷纷著书立说，对文房清供的勃兴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中期的王佐增补了曹昭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的《格古要论》，辑成《新增格古要论》十三卷，书中增加了卷九“文房论（补遗）”，从工艺、产地、考据与鉴赏的角度对文房清供进行了论述。^[9]文震亨的《长物志》，综合概述了明代文人清居的物质环境，在卷七《器具》中，列入了众多的文房用具，并对所列文房用具几乎都作了点评。^[10]高濂的《遵生八笺》之《燕闲清赏笺》中列举了文具二十余项，分别至为详尽地论述了材质、形制、纹饰等。^[11]屠隆所著《考槃馀事》中的《文房器具笺》共记载有四十五种古人常用的文房用具，如砚匣、水注、水丞、水盂、水洗、墨盒、墨床、镇纸、压尺、笔筒、笔插、笔架、笔挂、笔洗、臂搁、印章、印泥盒、纸刀等。^[12]受文人精致化生活的影响，明代皇室的书房装饰与文玩赏藏之风极盛。朝廷投入巨大财力，使文房清供从文人自娱自乐的文玩提升为御用器。景德镇官窑烧制的御用文玩，无论是永乐、宣德的青花瓷，还是嘉靖、万历的五彩瓷，均精美绝伦，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明代御用监制作的漆、铜、玉、珐琅等质地的文房用具，造型典雅，工艺精湛，成为明代文房清供的代表作。

清代，文房的所备之物已一应俱全，文房清供的审美理念、工艺技巧更臻完善，并达到了鼎盛。文玩的流行、

繁荣与跃升，除了文人的潜心追求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爱好与推动。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历史上的太平盛世，三朝帝王皆具学养，雅好艺术，并鼓励甚至亲自指导工艺美术作品的创作，故此时的文房清供以宫廷制作的为最大宗。皇家作坊——造办处，物质力量雄厚，设备完善，并征召各地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入值内廷，再加上各地官员的贡品，使紫禁城成为文房用具精品的荟萃之地。御制文房用具的材质、制作工艺、装饰技巧，构筑成了一个琳琅满目的辉煌殿堂——康熙朝的器形延续晚明制式，或雄浑古朴或优雅柔媚；雍正朝的清新飘逸，雅致脱俗；乾隆朝的则繁华绚丽、雍容华美，均体现了祥和安宁的盛世特征。康雍乾三帝也将文房清供作为治世教化的道具，将文房的制作工艺和玩赏鉴藏的风气推向了顶峰。

文房清供是几千年书斋文化的载体，其不同的功能、独特的造型、丰富的材质，以及繁复的制作工艺，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的艺术世界，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虚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 [2] 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6期。
- [3] 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文物》1991年第10期，页19。
- [4] 《玉台新咏》是东周至南朝梁的诗歌总集。收诗769篇，共十卷。历来认为是南朝徐陵所编。
- [5] 见《全唐诗》第624卷。
- [6] 《洞天清禄集》，一作《洞天清录》。卷一，南宋赵希鹄著，为考古鉴古文物的著作。
- [7]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四子部五十四：“宋林洪有《文房图赞》一卷，元罗先登又为《图赞续》一卷，各系以职官名号。”明高儒《百川书志》：“文房职官图赞一卷·宋和靖七世孙可山林洪龙发以文房十八物各拟官职名姓字号图赞之。”
- [8] 《文物》1988年第11期，第48页。
- [9] 《格古要论》，中国现存最早的文物鉴定专著，书成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共三卷。上卷分为古铜器、古画、古墨迹、古碑法帖四论，中卷分为古琴、古砚、珍奇、金铁四论，下卷分为古瓷器、古漆器、锦绮、异木、异石五论，共十三论。
- [10] 《长物志》，明文震亨撰，成书于1621年。记载文玩的著名文献，共十二卷，综合概述了明代文人清居生活的物质环境。
- [11] 《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明高濂撰。全书二十卷，分为《清修妙论笺》、《四时调摄笺》、《却病延年笺》、《起居安乐笺》、《饮馔服食笺》、《灵秘丹药笺》、《燕闲清赏笺》、《尘外遐举笺》等八笺。是一部内容广博又实用的养生专著，也是我国古代养生学的主要文献之一。
- [12] 屠隆，字长卿，又字纬真，号赤水，鄞县（今属浙江）人，明代戏曲家、文学家。作《荒政考》，描述百姓灾伤困厄之苦。有《栖真馆集》、《由拳集》、《采真集》、《南游集》、《鸿苞集》及《考盘余事》、《游具杂编》、《文具雅编》诸集。



文房清供概述

赵丽红

文房清供特指书房清雅的陈设器具，即与笔墨纸砚相应发展而来的各种辅助用具。笔墨纸砚早在汉代发展成熟，逐渐确立了其主导地位，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相应出现了一些辅助用具，根据不同用途，分别命名为笔架、笔床、笔船、笔筒、笔洗、笔掭、水丞、砚滴、水注、砚屏、墨床、镇纸、镇尺、臂搁、印章、印盒、印规、仿圈、纸刀等。这些辅助用具的出现要晚于笔墨纸砚，它是伴随着笔墨纸砚的发展而繁衍兴盛，并形成了各自的发展体系，成为书斋重要的陈设器具。这些器具统称为“文房清供”。

文房清供自汉代开始兴起，唐宋时期得到发展，出现多种不同用途和形制各异的文房器具。其分工明细，制作极为讲究，受到文人的青睐。文人即兴之作，题诗咏歌，成为一时风尚。这些器具，因制作小巧精致，常常陈设于书斋文案，明代文人又称其为“斋中清供”。明代出现记述文房清供的专著，明屠隆《考槃余事》、《文房器具笺》，明文震亨《长物志》，都详细记述了书斋陈设器具及其发展演变。按其功用所列品名多达四十几种，明清时期文房器具的发展达到鼎盛，成为点缀书案、赏玩自怡的书斋陈设品。

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文房清供，数以万计，大部分是明清皇家日用书房陈设或处理政务专用，由内廷特制或地方恭进。材质丰富，不惜工本，大量制作。如玉石、水晶、玛瑙、玻璃、金属胎珐琅、陶瓷、竹木牙雕、漆器等制品，应有尽有。造型多写实，或因材施艺，出奇精巧。采用圆雕、镂雕、凸雕、浮雕、线刻等，各种传统工艺技法运用自如，可谓集中国传统工艺制作之大成，无不渗透了能工巧匠的聪明与智慧，也体现了明清时期各种传统手工艺制作的高度发展。

一、文房清供的形成与发展

(一) 文房清供形成的原因和条件

笔墨纸砚的发明和使用，使中国有了文字记录的历史。作为传播古代文化的重要媒介，它不仅使古老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而且使中国发展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

文化的文明古国。在笔墨纸砚不断发展的同时，又繁衍生成多种形制各异、内涵丰富、极具个性的辅助文房用具，并成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珍品。这些辅助用具的兴起虽晚于笔墨纸砚，但它是在笔墨纸砚的成熟运用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的。它的出现，一方面是对笔墨纸砚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笔墨纸砚书写用具的成熟使用，也必然决定了这些辅助文房用具的出现。自汉代开始有砚滴展露，此后历代承袭旧制，不断创新发展。特别是唐宋时期，相继出现了一些成组的辅助用具——笔架、笔床、镇纸、水注、砚屏等不同的称谓和不同形制及用途的器具。现知唐宋墓葬中有大量的文房辅助用具出土，也成为文房清供形成和发展的实物见证。明清时期，随着传统手工艺制作的发展，文房清供的制作也发展到极盛，制作种类更是丰富多样，造型、材质、装饰等也不断创新，逐渐发展演变为极具实用价值与艺术相结合的艺术珍品，成为书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也成为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二) 文房清供的发展

文房清供的形成是继笔墨纸砚成型以后，在汉代逐渐出现，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大致概括为四个阶段。

1. 东汉时期的形成阶段

汉代笔墨纸砚用具已完成了从发生至初步成型的过程。以笔墨纸砚为主的书写用具，逐渐确立了其相辅相成的地位，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逐渐发展成熟。此后，辅助笔墨纸砚的文房器具相继出现。现知最早出现的辅助用具应是汉代的砚滴。如江苏扬州老虎墩东汉墓出土的一件白玉飞熊砚滴，形制小巧，主要用于滴水研墨。此器肖动物造型，为早期的砚滴形式，对后世颇有影响。^[1]这一时期，彩绘漆器成熟发展，并有大量官作制品，用于调色的辅助文房实用器具也有少量出现。这时文房器具从实用上逐渐完善，相应的辅助用具也具雏形。

2. 魏晋时期的发展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房用具得到全面的发展，出现多种形制的辅助用具，其质地和造型出新，并形成定式，对后世形制的发展颇有影响。文献史籍多有记载。如西晋葛洪《西京杂记》记述：“晋灵公冢……其余器物皆朽烂，不可别，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王（广川）取以为书滴。”记载了广川王盗墓得玉蟾蜍，改制为书滴，即砚滴。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有注水用具，如水孟（水丞）、水注等。其造型小巧精致，一般为小口，圆腹。其材质有陶、瓷、玉、铜等。如两晋时期，以越窑的青瓷水孟最具特点，并在各地广泛制作，其中蛙形青瓷水孟（水丞）成为独特的造型，一时流行于世，争相效仿。文房清供呈现出发展趋势。

3. 唐宋时期的兴盛阶段

唐宋时期，是一个文风极盛的年代。书画艺术的兴盛发展，同时也大大促进了与绘画休戚相关的书写用具的发展，形成了以湖笔、徽墨、宣纸和端砚为重要组合的文房四宝。宋苏易简《文房四谱》专著问世，标志着传统的书写工具的完善。此后，笔墨纸砚在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繁衍出多种用途各异的辅助用具，笔架、笔床、笔格、砚匣、砚屏、水注等相继出现，文房清供的发展逐渐呈现出兴盛的态势，并形成各自的历史沿革体系。文献也多有记载，如《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之称，宋赵希鹄著《洞天清禄集》详细记录了各类文房用具。其中有砚匣、砚屏、笔格、砚滴等。宋周密《云烟过眼录》也记有砚滴、灵壁砚山、古玉笔格等。宋林洪《文房图赞》和元罗先登、樊士宽的《续文房图赞》中，也罗列了多种文房用具。文房清供器具成为文人必备之物，争相试用，更有文人自制，互赠诗赋题咏，鉴赏收藏，成为一时风尚。

唐宋时期，文房清供的兴盛主要表现在造型、质地不断出新，不仅形制种类多样，而且还出现有成套组合或一器两用的形式，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特点。如1981年7月浙江诸暨出土的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董康嗣及其

妻周氏合葬墓中的一套成组的石质文房用具，有蕉叶白端砚一方、石雕山峦笔架、犀牛镇纸两件、龟纽水盂，其石质色泽黝黑，细腻滑润，造型别致，可谓罕见^[2]。又如浙江衢州南宋咸淳年间史绳祖墓，出土了多件文房器具^[3]，其中有青玉笔架、水晶笔架、白玉兔形镇纸、玉荷叶形洗、白玉印等，呈现多件组合的形式，反映了这一时期文房用具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这一时期，还出现有一器两用的形式，如江苏无锡兴竹宋墓出土一件影青瓷笔架水注，造型为双兽形，兽体中空为水注，其上出角形似笔架，为一器两用的形制。^[4]另外，在长沙窑中也有大量的瓷笔掭、水注、镇纸发现。1996年江苏宝应县北宋墓出土的文具中有一件南瓜形水注^[5]，为典型的北宋影青瓷，制作巧妙，小小瓜棱具显，一片瓜棱小破洞口，巧为注水孔，瓜蒂相连，形似逼真。上述这些实用器具——笔架、镇纸、水注、笔洗等均为宋代流行器具。这一时期，文房清供器具的形式种类多样，并不断创新发展。

4. 明清时期的繁荣阶段

文房清供发展到明清之际进入繁荣阶段。这一时期，由于文房四宝的兴盛发展，与之相应发展的辅助用具更出奇精巧，形式多样。如水丞（水孟）、砚滴、水注、笔洗、笔筒、笔格、墨床、砚屏、镇纸、臂搁、印盒、印章等用具，在书斋文案上各居其位，各司其职，日臻完善，并成为文人必备之物。文房清供的种类、材质、形制等方面发展到了极致。

明清之际文房清供的发展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休戚相关的。这一时期，城市经济高度繁荣，文士阶层迅速扩大，对于书斋文房清供的需求也日益增强，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传统手工艺人的创造能力，使文房清供的制作得到全面发展，可以说是集多种工艺之大成。这在明代文献中有大量记载。出现专门的著述，如明屠隆《文房器具笺》所列文房器具有笔格、笔船、笔洗、水注、印色池（印泥盒）、镇纸等数十种。明文震亨的《长物志》卷七《器具篇》言及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

砚（掭）、水中丞、水注、糊斗、蜡斗、秘阁（臂搁）、镇纸、压尺、印色池等多种。明高濂的《燕闲清赏笺》也有《文房器具篇》，对文具匣、砚匣、笔格、笔床、笔屏、水注、笔洗、水中丞、砚山、印色池、糊斗、镇纸、图书匣、臂搁、笔觇（掭）、墨匣、笔船等都有专文论述。明代墓葬中也有实物出土。如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墓有不少文房用具出土，有青玉砚、碧玉笔架、水晶水盂、水晶鹿镇纸、玉荷叶形笔洗等，均材质稀有，成为明代文房清供发展的重要实物见证^[6]。

清代内廷书斋陈设更为讲究，文房清供器具制作精美。康雍乾时期承袭旧制并不断创新。特别是乾隆皇帝对文房清供更是珍爱备至，不仅大量制作陈设或赏玩，而且有大量御制诗篇题咏。如《咏乌玉笔筒》、《咏和田玉荷叶洗》、《咏玉天鹿砚》等等。乾隆时期制作数量也极为可观，内廷造办处活计档多有记载，除地方各织造承办的年例贡品外，内廷造办处各作坊还有大量的制品，多遵照皇帝的旨意设计样式，有成组多宝格形式或成套制作的文房清供，还有便于外出使用的旅行用文具箱等，都是典型的内廷造办处制品。这些都体现了乾隆时期文房清供制作的繁荣发展。

清代御用文房清供，其种类丰富多彩，无论在品类、材质和制作上都远胜于前代。笔筒、镇尺、印盒、臂搁、砚屏、墨罐等相继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文房用具的种类，也使各项辅助用具的功能更为完备。各种材质陶瓷、竹木、象牙、玉石、玛瑙、水晶、金银、珐琅、铜、铁等，都被用来制作各式文房清供器具，成为书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清代宫廷御用文房器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清代内廷文房清供的制作及其种类特点

清代康熙时期，内廷作坊林立，招募各地贤能艺匠，专门承做内廷室内陈设器具。文房清供的制作也极为讲究，

皇帝所居之处，斋堂轩室，书房需有大量的清供陈设。据记载，清代皇帝根据个人的喜好，都增设和更换过各处陈设。特别是在乾隆时期，宫廷文化生活极为丰富，制作有大量的陈设器具并传于后世。清代嘉庆、道光以后，开始禁止扬州贡玉，或酌减贡物，其制作规模逐渐缩小，各地进贡物品的数量也明显减少。其质地种类也日渐式微。

（一）清代内廷文房清供的制作

清代内廷文房清供的制作，均为造办处各作坊承办。特别是乾隆时期，其制作规模、数量庞大，内廷器具的制作过程，均有档案记载。这些不仅反映了内廷作坊管理的极其严格，从中也可得知其制作的规模。如乾隆三十五年“匣作”记载^[7]，所列配匣文具有“白玉佛手笔掭一件，（木座）腰元洗、青花白地小水盛一件，青绿蛤蜊笔掭，青玉瓜式水盛，白玉双鱼洗，掐丝珐琅水注，霁红笔洗一件，青绿马纸镇，青花白墨罐一件，哥窑小笔洗一件，白玉合卺觚，配得合牌座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交淳化轩续入多宝格内摆”，还有“定窑有盖墨罐一件，定窑水注，青绿龟式水注，汉玉鸳鸯水注，哥窑葵花笔洗”。其中所列清供器具有水盛（水丞）、墨罐、笔掭、笔洗、水注、纸镇，均按不同功用分别命名，其质地种类多样，造型也出奇精巧。这些器具不仅实用，而且也成为内廷书斋的重要陈设。另外还制作有多种功用或多种器具组合的形式，如“文竹盘二件，内盛文竹笔筒、墨床、镇纸、水盛、砚盒随绿石砚……交江宁织造寅著照样成作，文竹笔山二件，又笔山发往杭州，交寅保照样配做笔山二件，其盘内糊雪花锦垫”^[8]。其中所列文竹多盛盘，均有传世制品。

文房清供器具的制作来源，除了内廷制作外，也有一些是地方巡抚进贡，其形制、种类也多样。据宫中进单记载^[9]，“乾隆六年四月，造办处员外郎，奴才王慎德跪进，巧色彩云笔洗成件，巧色蟠桃花插，宋制脂玉笔洗，宋制银晶砚山，绿晶英雄书镇，汉制玉马镇纸，巧色玉

马镇纸，宋制玉蟹镇纸，巧色玛瑙水盛，宣窑宝莲水盛等”。其中笔洗、镇纸、水盛等，也多有玉石制品，还有少量的官窑瓷制品。又如，宫中进单记载，“乾隆八年闰四月二十六日，杭州织造苏赫纳，恭进有白玉砚屏成件，白玉笔搁成件，白玉荷叶水盛成件”^[10]；又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七月初十日，江苏巡抚明德跪进“五岳端砚一方，青绿笔掭、脂玉仙鹤镇纸、脂玉莲瓣水丞、脂玉雷纹墨床、成窑印色盒各一件”^[11]，其中所列笔掭、印色盒均为瓷制品，镇纸、水丞、墨床均为玉石制品。这里记载的各种质地和种类、形制基本上与藏品实物相符合。又据记载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八月十二日成亲王贡进脂玉多件，其中有“白玉刘海笔山，白玉荷叶笔洗，白玉双禄镇纸，白玉瑞兽水吸，白玉太平人瑞成件”^[12]，均为和田羊脂白玉。又如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护军统领庆泰进单中也有“白玉瓜瓞连绵水注一件，白玉双螭笔洗一件，翡翠石水盛一件，宋冬青小洗一件”^[13]。从以上记载得知，内廷所需文房清供不仅质地种类形式多样，而且材质上均以玉石、翡翠、瓷制品为主，也有少量的竹木牙雕制品，均不惜工本，精工细作。仅文房器具的进贡数量也实为可观。各地方巡抚官员也投其所好，所进文房器具多为玉石和仿宋官窑制品。由于内廷的大量需求，文房清供器具的种类也向多样化发展。

（二）清代内廷文房清供的种类特点

清代宫廷文房用具均以内廷样式制作，一部分是出于内廷造办处制作，一部分是交由地方按内廷式样制作，也有地方巡抚官员按年例进贡的方物。现知藏品中仅文房用具数量即多达十万余件，造型质地种类丰富多彩。清代宫廷御用制品更是争奇斗艳，从中不仅体现了文房用具的制作古雅精巧，而且还可窥见清代各种手工艺制作的发展概况。

1. 康雍时期文房清供的种类特点

清康熙时期，文房清供器具种类丰富，主要表现在各种瓷质文房器具的制作呈现繁荣景象，其形制、釉色多种多样，如墨彩、粉彩、青花、单色釉、豇豆红釉、冬青釉、粉白釉、粉青釉、珊瑚釉等均有制品。墨彩为釉上彩，也烧成于康熙时期，其墨彩竹枝臂搁、墨彩笔筒等均为代表制品；又如最名贵的白釉暗团龙纹太白尊式水丞，造型为直径小口，圆腹，平足，底部青花楷书“大清康熙年制”款，极为少见。另外，还有粉白釉水丞制品，康熙时期的冬青釉龙纹文具盒，以调色为主要用途，也都是康熙时期特有的精品。

画珐琅清供制品更为典雅，如康熙御制画珐琅莲瓣式水丞，巧作盛开的莲花，花瓣朵朵鲜艳，铜镀金口沿，并附铜镀金水勺。底部有青花楷体“康熙御制”方印款。水盛铜胎厚重，以小巧精美取胜。另外还有康熙时期处理朝政专门制作的铜镀金掐丝珐琅匣暖砚，为内廷特制御用品。

这一时期，民间流行的紫砂器具也进入宫廷。清代初期，紫砂制品提炼精纯，砂泥细腻，烧制技术更为成熟。清代康熙、雍正时期极为流行，始有贡品。内廷所制紫砂笔筒，造型出新，不拘一式，有圆形、方形、竹节形等多种，并堆塑、施彩描绘，或水墨写意，或山水人物，意境深远。还有刻花水丞、笔洗、臂搁、秋叶笔掭、白果砚滴、双桃水注等，均为出奇制胜之品。并受到雍正皇帝的喜爱。其制作有紫砂笔筒，采用堆塑、描金、彩绘等艺术手法，将山水人物风景再现于笔筒之上。如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雍正时期的色泥堆绘黄砂笔筒，利用通景构图，层层渲染，一幅江南自然美景展现于笔筒之上，意境深远，应是出自造办处画师手笔。从中也可窥见内廷制作紫砂器的风格、品味。

清雍正皇帝喜用玛瑙制品，文房清供的制作，也多有利用玛瑙的自然纹理巧做成各种水丞（水盛）、笔洗等，

颇为文雅。据内廷造办处活计档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年）正月，玉作传作有“端阳节玛瑙松寿同庚花插一件，玛瑙一把莲水盛一件，玛瑙福圆水盛一件，玛瑙福寿水盛一件，玛瑙福寿笔洗一件，玛瑙福如东海笔洗一件”^[14]，从中得知内廷文房清供的制作种类多样。这些清供制品多以福寿为装饰内容，寓意祈福祥瑞，是雍正时期的装饰特点；此后此题材也成为内廷器物重要的装饰内容。

雍正时期瓷质文房清供也丰富多彩，现知藏品中最具特点的有墨彩、木纹釉、青花等，均制作典雅。墨彩为釉上彩，是在素白胎器上描绘纹饰，经炉火烧后，白地上呈现浅淡墨色花纹，犹如水墨画效果。以笔筒、臂搁等制品最佳。木纹釉也是雍正时期的创新品种，其木纹釉色黄褐相间，纹理刷丝，俨然如木，极可乱真，景德镇烧制的木纹笔筒最成功。

雍正时期，玻璃制作工艺水平高超。所制玻璃制品极为精美，可惜传世品很少，只见有少量的笔架、笔筒、水盛等制品。据雍正十年（1732年）内廷造办处活计档记载，曾制有“呆白玻璃胎泥金画珐琅花卉水盛一件”，但尚未见有传世品。又据雍正九年（1731年）玻璃作记载，“做玻璃笔架二十件，不要单做葛出哈夫金式样，或双桃，或如意，或挑选好样的做，钦此”。但因其质地易损，保存传世品甚少。雍正十二年（1734年）九月做万寿节活计中所列品种，除了有玛瑙笔架、水盛、笔洗多件以外，还有“呆绿玻璃笔架，呆绿玻璃加金笔架四件，呆蓝玻璃笔架四件，”^[15] 其中所述各色玻璃笔架制作精美，但传世品甚少。现藏品中有一件圆形玻璃笔筒，为白套红料制成，制作也精巧。还有少量的玻璃水丞（水盛）制品，并署楷书“雍正年制”款，也成为稀有珍品。

雍正时期，画珐琅制品也独具特色。如画珐琅双桃式水盛，造型极为肖形，桃枝巧作握柄，装饰绿色枝叶，粉红色渲染成熟的桃果，其上饰以飞蝠，寓意福寿吉祥。底

部楷书“雍正年制”款，极为富丽典雅。

这一时期牙雕制品也较盛行，一般是由广东购进原料，再由内廷广东牙匠艺人制作。如笔架、笔筒、臂搁、镇尺、笔床等均有制品，档案文献也多有记载，如雍正三年“牙作”制有“象牙雕花笔格一件，松鼠葡萄笔架一件”，又“象牙雕鸡式笔架一件，荷叶式臂搁一件，嵌黄绿石夔龙纽紫檀木镇纸一件，象牙五美重阳笔架一件”；雍正五年还做有“福禄寿象牙笔床，节节双喜象牙笔筒”……^[16]，其中所列象牙清供形制多样。现藏品中还有象牙管笔、笔筒、臂搁、镇尺等传世，均制作精美。又据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记载“雍正十二年，禁广东进象牙”。其后，牙雕制品也逐渐稀有，多制有小件文房器具。

2. 乾隆时期文房清供的种类特点

乾隆时期，文房清供的制作规模更盛于前朝，在发展中更趋完善，不仅材质多样，种类也很丰富，不惜工本并大量制作。如笔屏、砚屏、墨罐、笔船，铜墨斗、笔掭等多种形制出现，而且还出现以多宝格形式制作的成套文房清供珍玩，少则几十件，多则几百件，装潢精美，可谓极尽奢靡。如乾隆元年匣作记载，制有“松花石盒一件，珐琅水盛一件，汉玉双喜笔屏一件，宣窑青花白地墨罐一件，碧玉天鹿压纸一件，玛瑙水注一件等二十八件”^[17]。其中所列笔屏、墨罐都是形制出新。作为书斋陈设，内廷还制作有多种百什件珍玩，用多宝匣盛装，其数量可观。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开始修建宁寿宫，其中宁寿宫花园、养性殿、淳化轩、墨云室、倦勤斋等处均制作大量的文房清供陈设。最多数量高达百种，分别有瓷器陈设，玉文玩，扇子，如意，三式炉瓶盒等，多陈设在各殿宇多宝格内或宝物箱内。其质地品种也不可胜数，如“花玛瑙压纸一件，玳瑁盒表一件，白玉螃蟹压纸一件，碧玉双马压纸一件，碧玉荷蟹笔洗一件，白玉秋叶笔洗一件，熊窑笔洗一件，蜜蜡甜瓜式鼻烟壶一件，佛手鼻烟壶一件，朱墨一锭，

象牙起子一件，乌木尺子一件，湘妃竹笔一支，玛瑙笔管一件，白玉心猿意马压纸一件”等等。又有配做百十件，其数量种类繁多，争奇斗巧。如“紫檀木笔船，铜墨斗一件，铅笔二支，荆州石灵芝笔揅（掭）一件，玛瑙子砚、白石英笔架、银墨罐、玳瑁千里眼、花石盒松花石砚、白铜规矩、铜规矩、铜镀金规矩、墨夹各一件，铅笔二支等等，以上共二百四十六件，洋漆纸锦等样匣在外。盒内另配端砚二方，珐琅象棋另配磁青纸一面，大棋一面，象棋盘一件。将大棋、象棋和配一书套式匣盛装……”^[18] 其中铜规矩、墨罐、墨斗、笔掭等都是乾隆时期流行的品种。以上这些记载反映了内廷制作各种文房器具的规模庞大，用途也广泛。一方面作为宫廷殿宇书斋陈设，另一方面也成为实用与鉴藏为一体的赏玩品，在清代尤为盛行，到乾隆时期达到鼎盛。并以多种成套、成箱制作的文房清供珍品最具特点。如雕漆文具多盛盘，还有旅行文具箱等都是乾隆时期制品。

乾隆时期，内廷玉石材质丰富，加工技术精湛，制作数量可观，其中也不乏一些仿古制品。文房清供的制作更以小巧精致取胜，各种形制均有制品。笔筒、笔架、笔洗、笔山、砚屏、水盛、水注、砚滴、墨床、镇纸、花插、均成为书房典雅的陈设。玉质笔洗的制作最具创意，形制不拘一式，造型多样，并与装饰内容融为一体，多以花卉植物为形，如白玉海棠洗，汉玉秋叶洗，白玉鹤舞升平梅花洗，白玉事事笔洗，碧玉莲叶笔洗，玛瑙葵花笔洗等等，均因材施艺，造型别致，成为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艺术珍品。除玉石材备受青睐外，瓷制品也受到内廷的喜爱，一般多是地方官窑烧造进贡，如成窑、宣窑、汝窑、官窑、钧窑等都有制品。现藏品中也以官窑制品为多，如仿宋官窑笔洗、笔架，其釉色品种多样，如珊瑚釉笔洗、水丞均有制品。木纹釉笔筒、臂搁也是这一时期的流行品种。

乾隆时期珐琅文房器具种类多样，颇具宫廷特色，有

珐琅匣暖砚、笔筒、笔洗、笔架、水丞、镇纸、墨床、仿圈等，并出现多组成套制品，为处理朝政专用器具。如画珐琅百花笔洗，造型简洁，装饰华丽，笔洗内壁装饰百花齐放，色彩艳丽，外壁装饰白地蓝彩缠枝莲纹。底内珐琅彩绘飞蝠和连枝寿桃，寓意福寿吉祥，其上楷书“乾隆年制”款，落款形式新颖，也是极为少见的精品。

3. 清代嘉道时期文房清供的种类特点

清代中晚期，嘉庆、道光以后开始禁止扬州贡玉，其制作规模逐渐缩小，各地进贡的数量减少，其质地种类也日渐式微。嘉庆喜用玉石砚，其所制砚品有玉石砚、松花江石砚等，砚品均署刻篆书“嘉庆御赏”。这一时期，内廷作坊仍沿袭制作。毓庆宫曾是嘉庆皇帝的书房，其内有继德堂、味余书室。先后均有成做百什件器具陈设。如造办处活计档记载，在嘉庆元年（1796年），曾将百什件盛古玩配做雕龙博古花样的木箱。所列清供器具有一百三十件之多，其中有“钧釉葵花式水盛一件，铜勺。青玉鳌鱼压纸，玛瑙松椿水盛，珊瑚勺。玛瑙桃叶笔掭，白玉墨床，青玉砚一方，嵌玉紫檀木墨匣。汉玉十二相押纸，甘黄玉星文笔筒，白玉鸳鸯笔山，白玉诗意图背搁，汉玉耆草方筒，紫石圆砚，青玉桃式水盛一件，珊瑚勺。青玉琴式背搁，白玉雕龙背搁，红雕漆诗意图笔筒，问政山图墨一锭，清芬阁藏墨，珐琅笔筒一件”^[19]。从中可知嘉庆时期文房清供制作的基本概况。上述所列文房清供种类多样，材质有玉石、玛瑙、珐琅等，都是民间少有的。其称谓虽有称笔架为“笔山”，臂搁为“背搁”，镇纸为“压纸”的。但其制作形制仍承袭旧制。嘉庆初期，除以上所列各种文房清供的制作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成组或成套百什件用具的制作，也颇具宫廷特色。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有一件“嘉庆年制”雕漆文具诗册匣，制作精致，长方形匣内嵌檀香木，内有端石小砚、青玉管斗提笔两支、御制文房四咏诗册三函、“九贡”墨、绵纸等多件文具，诗册上有“嘉庆御览之宝”印记，

为嘉庆御制精品。其后，道光时期，虽沿袭制作，但数量也逐年递减。这一时期，提倡勤俭，曾多次禁止例贡方物，而内廷实用器物的制作也日渐式微，制作规模和数量逐渐减少，内廷流行的套装文具匣的数量也明显不及前朝。

4. 同光时期文房清供的种类特点

清代晚期，同治、光绪时期，文房清供器具的制作仍有承袭旧式，但数量逐渐减少，材质多有竹木、瓷、玉石等。也有少量的创新器具出现，如文人自制的铜墨盒，即将墨汁贮存在墨盒中，宜于实用，便于携带。此后，因有些传统技艺失传，其制作工艺简单，虽然也出现一些铜、铁、锡文房器具的制作，但形制不见有创新。这一时期，毛笔除了竹质笔帽外，还流行一种铜质笔帽，一般形制较长，可套装湿笔，并有保护笔毫的作用。另外，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笔插形制，其笔插之上均制成固定的各式笔帽，可直接将笔毫插于笔帽。帽管数量不等，一般有二、三、五个帽管，可插毛笔多支。这显然是由唐代流行的笔插形制演变而来。清代晚期，因材料缺乏，内廷各种器物的制作也日渐衰弱，制作工艺也失精致。

总之，文房清供的制作，历代沿袭创新发展，在明清时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极具实用价值与艺术相结合的艺术珍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人品味。特别是清代宫廷制作，工艺精湛，更凝聚了能工巧匠们的聪明与智慧，今能寓目，令人叹为观止。

三、文房清供的分类

文房清供的分类，按其用途大致归纳为：（一）、笔之属，包括毛笔、笔筒、笔架、笔床、笔插、笔屏、笔船、笔掭、笔洗；有置笔用具、浣笔用具、匀笔用具，既有横放毛笔也有竖放毛笔的工具。（二）、墨之属，包括墨、墨床、墨罐、墨匣、墨盒等；为放置墨的用具。（三）、纸之属，包括纸、

镇纸、压尺（镇尺）、臂搁、仿圈等；为镇纸临写书法用具。

（四）、砚之属，包括砚、砚滴、水注、水丞（水盂、水盛、水中丞）、砚屏等；为用砚的器具。（五）、印章、印泥盒、印匣；为署名印文的用具。（六）、多宝文具匣；这种文具匣形式，最初以实用为主，便于出行使用，后逐渐发展为以收藏与鉴赏为主的艺术珍玩。

注释：

- [1] 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文物》1991年10期，页19。
- [2] 莜暨县文管会 方志良《浙江诸暨南宋董康嗣夫妇墓》，《文物》1988年11期，页48。
- [3] 衢州市文管会：《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考古》1983年11期，页1004。
- [4] 无锡市博物馆：《江苏无锡兴竹宋墓》，《文物》1990年3期，页19。
- [5] 《宝应北宋墓群发掘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3月9日第10期。（总第525期）
- [6]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5期，页25。
- [7] 清乾隆三十五年档案，胶片号1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8] 清乾隆三十五年档案，胶片号1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9] 清乾隆六年，官中进单009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10] 清乾隆八年，官中进单002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11] 清乾隆三十二年，官中进单008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12] 清乾隆三十五年，官中进单002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13] 清乾隆三十六年，官中进单002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14] 清雍正十三年造办处活计档案，胶片号74. 第一历史档案馆
- [15] 朱家溍《雍正朝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2003年，紫禁城出版社
- [16] 同注 [15]
- [17] 清乾隆元年造办处活计档案，胶片号7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18] 清乾隆元年造办处活计档案，胶片号7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19] 清嘉庆元年造办处活计档案，胶片号15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